

# 当西方的物质遇上东方的心灵



印度瓦拉纳西的恒河

## 大多数人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更加无法找到自己的内心所属

潘卡吉·米什拉的童年时代曾遭遇变故。父亲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印度西北部小村庄，原本家庭生活相对富裕，不过长辈无甚志向，只将钱财投入房产和珠宝，或赞助一两座寺庙，除此之外完全被极其繁重的日常劳作吞没。米什拉坦言，按照尼采的说法，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拥有某种“奴隶的喜悦，既无须对任何事情的后果负责，也不认为过去和未来竟有任何事要比当下更值得珍惜”。

虽然当时的印度处于殖民统治之下，但在米什拉生活的小村落里完全感受不到这一点。代表现代社会和殖民统治的法院、警署和税务局等机构，要在距离村子最近的镇上才能见到，即使坐牛车也要走上几个小时。当米什拉的父亲真正见到村子以外的世界时，印度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因为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其他各种因素，米什拉的家变得一贫如洗，而且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乡村。

米什拉在《苦厄的终结》一书中写道，在当时的印度，“数以百万计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：被迫离开自己的原生环境，流落到陌生的异乡，赤手空拳地置身于自由和痛苦之中——佛陀对此早有探讨，维诺德也提及过。但是，每个人仍要独自承受这样的认知：维系旧日种姓制度与社会阶层的支柱已不复存在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，既带来自由，也带来痛苦。”

当然，这种巨变也意味着机遇。对于米什拉的父亲乃至同代人来说，基于生存而产生的选择路径非常明确：“必须去西式学府接受高等教育，如医学和工程院校。在那里，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拿到了学位，并准备好投身于新近独立的印度屈指可数的工作岗位。如果他失败了，就意味着要回归一穷二白的乡村生活；一旦成功，他便可以获得和享受诸多事物——电扇、自来水，甚至平房、仆人和汽车——也就是英国人从前在此地享有过的物质生活。”

于是，一列列蒸汽火车从各个地方启程，“驶过河流、湖泊和峡谷，穿越广袤的旷野，以及星罗棋布的小城和聚落，最终抵达难以想象的大型官僚和金融都市——孟买和德里。”

其后，印度迎来了高速的经济发展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赢家是极少数，大多数印度人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更加无法找到自己的内心所属。

潘卡吉·米什拉(Pankaj Mishra)，著名思想家、评论家，1969年生于印度，现居伦敦。米什拉长期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后殖民问题，为《纽约书评》《纽约时报》《卫报》等媒体撰写多篇评论，以雄辩的文风和犀利的观点著称，被《经济学家》誉为“萨义德的继承者”，被《外交政策》评为“全球百大思想家”之一。这样的一位思想家，也有着自己的困顿。

印度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实现迅猛发展，但在这腾飞的新世界中，大多数印度人找不到自己所属的位置。

在这样一片大陆上，潘卡吉·米什拉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旅程。他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村庄出发，拜访佛陀诞生地蓝毗尼；前往德里，倾听青年对佛教等古老思想的不满；在暴乱不断的克什米尔，遇见一个个只能在封闭阴冷的房间里泄愤和哭泣的异见者；最后回到喜马拉雅山麓的村舍，在这个充满暴力又困惑丛生的世界中，重新书写佛陀。

米什拉的《苦厄的终结》将佛陀的故事与佛陀出生地附近的村庄，乃至印度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等地的故事联系在一起。沿着佛陀的思想轨迹，米什拉行走在东方智慧与西方哲学之间，用思考连接现实和历史，在佛陀教诲中寻找终结苦厄的可能性。

这不是一本关于佛教教义的著作，而是一位知识分子的自省顿悟之书。这是一个曾经穷困的知识青年书写的个体精神之旅，为理解佛陀而开始、最终以认清自我而结束。



《苦厄的终结》

## 十年自我寻找之旅

面对这种状况，潘卡吉·米什拉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旅程。他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村庄出发，拜访不再辉煌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；前往商贸大厦与露天排水沟并存的德里，倾听青年对佛教等古老思想的不满；在暴乱不断的克什米尔，遇见一个个只能在封闭阴冷的房间里泄愤和哭泣的异见者；最后回到喜马拉雅山麓的村舍，在这个充满暴力又困惑丛生的世界中，阅读大量史料，穿梭于尼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中，重新书写佛陀。

他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：佛陀的思想能否缓解当下人们因当今世界的政治无能而产生的痛苦？个体的视角中，这持续的苦厄，究竟有没有可能得到片刻的终结？

对于印度人来说，佛教无比重要。但米什拉的视角显然超越了印度，转向全人类的迷惘与未来。佛教与西方世界能否“兼容”？他也试图给出答案。

米什拉在书中以美国为例，阐释佛教的“治愈功能”。他写道，佛教在美国可谓满足了当地人的各方面需求，最初以某种理性宗教的形式传入，但接纳的人很少，直至20世纪60年代，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。“在那段纸醉金迷

的日子里，佛教再度改头换面，以禅宗的神秘主义形式，成为心理治疗和瘾君子喜好的流行替代品，或说标配装饰物。”

但佛教真正进入美国主流社会，还是上世纪后期的事情。与此同时，它饱受政治抗议和道德伦理的考验，且日趋商业化和商品化。

米什拉引用了尼采在19世纪末的预言：“当科学与进步摧毁西方人曾经信仰的超验世界、上帝以及上帝赋予人类的价值观，当他们对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，佛教将如何恰逢其时地吸引他们的注意。”

尼采还指出，他那个时代的人都痴迷于经济的快速增长，殊不知，如此心态只会掩盖生命徒劳无益的真相，耗损人原有的价值，功利主义便是19世纪诸多空洞宗教的替代品之一。

这个观点在现代社会同样成立，人们为了所谓成就，只能不断拼命奋斗，要维持一种生活方式，就必须付出巨大代价。米什拉反抗的也恰恰是这种经济学乐观主义，他不认为随着所有人不断增长的开支，所有人的利益也必然会增长。他甚至认为情况恰恰相反，所有人的开支将累积成一种总体损失：人将变得更加渺小。

## 这样的心灵，甚至是面对世界残酷的唯一武器

对于现代人来说，佛陀的故事确实有启发性，这也让米什拉追寻佛陀的旅程显得更有意义。

佛陀原名乔达摩·悉达多，出生于印度北部，是释迦族的年轻王孙，原本生活富足。但他在目睹人间各种不幸后，陷入怀疑和自我反省，继而踏上寻求解脱的孤独之旅。他漫游于当时的印度北部，向世人阐释苦厄的起源与自己的想法，直到涅槃。

佛陀面临的世界看似远不及现代社会复杂，但具体到他身处的时代，人类恰恰也在经历巨大变革。面对各种苦难，人们却缺少应对手段，只能在固有社会体系崩塌的痛苦中陷入精神荒芜。佛陀的自省让自己得以解脱，他的存在也让人们找到了应对方法。佛陀的时代，与我们的时代，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在动荡的时代洪流中，伟大的思想者都会尝试给出对抗虚无主义的武器。两千多年前，佛陀就试图动摇人们心中那个被误以为独立自主或稳固不变的“自我”。因为历史的重演，我们又可以认真审视他的思想。

相比许多人对佛教抽象理念的纠结甚至假大空处理，或者将之歪曲为“躺平”，佛陀更为朴素务实，也更为“阳光”。正如米什拉所言：“佛陀从不纠缠于抽象的大问题，而更愿意鼓励个体正视眼前的处境。”佛陀并不赞同“自我”与“世界”的割裂，而是认为“控制自己的心灵，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自身与世界的关系”，强调万

物的共生，同时“在佛陀最先提出的假设中，心灵本来就有自我觉知和自我分析的能力，而且能觉察自身一切思想的活动与本质。”

这样的心灵，甚至是面对世界残酷的唯一武器。

百年来，人类世界遭遇过一次次巨大冲击，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。米什拉写道：“尼采确实有惊人的先见之明，却没能预见其所秉持的‘超人’道德观——自视甚高、艰苦奋斗、敢于牺牲、藐视传统礼法等——在上帝已死、一切皆可的年代，竟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思想。希特勒等现实版的‘超人’横空出世，不惜动用一切可用资源，从人才、劳工、到自然环境乃至足以招致死亡与毁灭的巨大官僚体制，只为了将自身意志强加给世界。他也没能预见，人类研发出具有毁灭能力的技术，但也正是这些技术（而非人类本身）将他视为一切生命之基的人类意志转化为权力，又经过一个无穷无尽且无明确价值观、方向感或目标的过程，让虚无主义成为普遍现象，不再局限于欧洲或西方。”

相比之下，佛陀似乎更贴近现代人的心灵，他深知：“即使囿于社会环境，囿于诸多难以理解的客观因素，人类依然拥有自我作为的选择余地，实现自身的存在意义，向他人传达缘起的本质及事物相互之间的依存性，追求合乎伦理的生活。”

这是对人类的勉励。

据《晶报》、新华社客户端